

时空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场景构建研究

温雯 赵梦笛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其时间、空间“场”的特征日益受到关注。现代化、城市化与数字化进程重塑了社会的时间节律与空间形态,非遗所依托的生活场域不断弱化,面临着“脱域”带来的挑战。在非遗的时空框架中,场景理论与“脱域-再嵌入”视角的结合有助于构建适配中国语境的非遗场景理论。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场景体系可从本土、跨域和虚拟三个维度构成,其运行具有流动性与演化性,体现了非遗在共时与历时角度的延续与创造、调适与再生,并通过以真实性重建本土关联、以戏剧性激活转化动能和以合法性确立数字认同的生活化、审美化、价值化路径,实现非遗在现代生活的“再嵌入”。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场景理论; 脱域-再嵌入; 流动性; 演化性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4.007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创造并通过代际传承得以延续的文化形态,本质上是植根于特定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与生活节律的活态文化实践,其生命力取决于能否持续参与现实生活并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中被理解、使用与再创造。进入现代社会,工业化和数字化进程改变了非遗赖以存续的时空条件,原本嵌入日常生产、生活与仪式活动中的非遗逐渐脱离其原生情境,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脱域”状态。面对这一变化,我国在政策层面通过立法保护、代表性项目及传承人名录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制度措施推进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并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和“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目标。在实践层面,从生产性保护、与旅游融合到数字化传播,非遗不断被纳入现代文化生产与治理框架,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但“高度可见”并不必然转化为“高度可传承”。部分非遗所承载的文化逻辑、社会关系与价值体系仍难以在日常生活中维系。

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已从文化生态^①、场域理论^②、情境保护^③等视角展开讨论。近年来,场景理论逐渐被应用于非遗研究中,涉及场景评价、乡村实践、传播展示、数字转化和文旅融合等议题。这些研究为理解非遗的现代传承提供了重要启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多停留在价值判断与规范倡议,对非遗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嵌入生活的机制阐释仍显不足;二是多侧重静态空间和制度结构,或是探讨场景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其价值表达功能,较少关注非遗在不同时空之间流动、转译与重组的动态过程;三是对非遗多元空间形态并行发展的现实缺乏整体性解释。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25BH201)。

作者简介: 温雯,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文化数字化与文化创新发展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深圳 518060; wenwenz2012@sina.com); 赵梦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4; mengdizzz@qq.com)。

① 刘守华:《论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黄永林:《“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2013年第5期。

② 吴薇、王晓葵:《“文化”场域的博弈与“遗产”价值的重构——基于彝族迁徙记忆遗产化案例的思考》,《民族学刊》2017年第6期;王秀伟、延书宁:《从场域到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空间转变》,《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黄涛:《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境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桑子文、金元浦:《中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传承理论创新——以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基于此,“场景”在作为理解非遗现代传承的关键分析单元时,可与吉登斯“脱域-再嵌入”^①视角结合起来。“场景”不仅是非遗发生的空间,更是由人群、活动、设施与价值观共同构成的整体性文化实践环境,揭示着非遗如何在特定情境中被体验、认同与再生产。那么,在现代时空结构变迁下,非遗如何通过场景构建实现再嵌入?非遗场景的基本类型、运行机理和动态特征是什么?场景的流动与演化如何推动非遗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实现当代转化与创新?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深化对非遗现代传承逻辑的理解,并为构建适配中国语境的非遗场景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一、非遗的时空性:场景构建的逻辑起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表现于有规可循的文化表现形式”,“另一种表现于一种文化空间,这种空间可确定为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②。这一定义凸显了非遗时空交融的形态与属性。从时间来看,“遗产”的属性决定其需历经代际淘炼,通过继承与发扬来延续群体性的生活记忆与文化传统,进而形成并强化文化认同;从空间来看,非遗的“无形性”并不意味着脱离物质载体,而是需依托纸、木、土、金属等物质载体,以及生活、工作、仪式等具体场所(或多场所的融合形态)得以呈现,且伴随社会发展经历着本土社区的流传、演变,走向跨地域的展演传播,以及基于数字空间融入生活的时空流动与转化。

(一)非遗的时间性

非遗的时间性体现在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及个体时间的交织上。一是彰显于非遗所蕴含的对时间的认知与相应的行为,如“二十四节气”等依据时节所产生的理念、庆典和仪式等。二是体现在非遗从传统到现代的延续与演化。非遗以人为载体而存在,其传承和延续依靠人的接力,因此非遗的传承是动态变化的。在时间维度下非遗的原真性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是历史的、相对的,可分解为最初的原状、过去某个时间点的原状和现在的原状,接受外在变化,传承精神的“原”和“真”才是真正的保护和传承^③。三是体现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认定为非遗项目的时间要求。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遗的时间仅通过“世代相传”来限定,重点是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④。正因为更强调延续和传承,以及在当下的意义与价值,非遗在现代化语境下成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得以在更广泛的空间传承发展。

(二)非遗的空间性

非遗的空间性,首先体现在“文化空间”被列为非遗的一种特定项目类型。然而,这类项目主要在21世纪之初获批,此后便不再有新增。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文化空间的评选往往和某些传统音乐、口头传统和庆典仪式存在交叉重合,这并不利于非遗的分类、管理和保护措施的实施^⑤。作为非遗的一种类别、形式和保护对象,一些学者针对具体非遗文化空间展开分析,如浙南畲族史诗《高皇歌》演述场域^⑥等。萧放、席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非遗文化空间是人、时空、文化实践彼此叠加的

① 吉登斯认为,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而“再嵌入”意指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已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无论是局部性的还是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69页。

② 邹启山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③ 周翠菊、杨雪松:《基于时间维度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艺术教育》2017年第19期。

④ 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年,第9页。

⑤ 陈震、王一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空间弱化现象分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2年第1期。

⑥ 孟令法:《文化空间的概念与边界——以浙南畲族史诗〈高皇歌〉的演述场域为例》,《民俗研究》2017年第5期。

复合型遗产^①。

聚焦非遗的空间结构及延展空间,林继富认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空间是传统空间、新建空间与网络空间有机融合构成的空间整体^②。王明月、马知遥则提出离散性空间这一非遗空间形态,认为这类空间具备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但在空间分散上呈现出跨区域的特点,以分散于各地共享特定生活方式的认同性群体为受众,依赖于行业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序运转^③。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非遗的数字空间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认为数字媒介重塑了非遗的时间过程与空间维度^④。

综上,非遗是文化与时空的结合,呈现出时空交错、时空并置的特征。非遗时空性的研究显现出三大趋势:一是对非遗原生空间及整体性保护的重视;二是非遗时空的多维并置,体现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以及乡土、传统文化空间在当代空间中的嵌入;三是非遗在数字时代,基于数字技术与数字媒介的生存、传播、再现及转化。在传统社会,非遗的时间节律与空间场所是有机统一的。时空分离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然而“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⑤。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非遗需要建立新的时空载体,这正是“场景”切入的逻辑起点。场景作为人、设施、活动、价值观的动态组合,通过空间的重构、流动及演化,为非遗时空性的当代延续提供场所并注入内涵,成为化解非遗时空矛盾的有效路径。

二、非遗场景的理论渊源

(一)场景及场景理论

“场景”最初指戏剧、电影中的舞台布景,后逐渐被应用于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Straw首次使用“音乐场景”来指代各种音乐实践共存的文化空间^⑥。在描绘单个场景的基础之上,学界开始聚焦场景的类型划分与社会意义阐释。Bennett将场景划分为本土、跨域和虚拟三种类型,本土场景指某种音乐类型或风格所生长的地方环境、流传群体和文化氛围;跨域场景指“本土场景扩散到其他地域,并围绕一种特定的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形成常规交流”,也体现出与其他地域文化及全球媒体信息的交流;虚拟场景可见于流行音乐杂志的评论,也包括互联网带来的音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⑦。随后,场景的应用逐渐扩大至各类文化实践(如诗歌、舞蹈)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如哥特、波希米亚风格)。

新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丹尼尔·西尔和特里·克拉克继承这一系列重要观点,将场景纳入城市社会的研究中,用来分析城市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并找到这种地方文化的特点与发展变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⑧。具体来说,场景理论从城市文化设施及活动出发,分析其价值取向和行为主体,认为可对其进行完善或加强,以吸引更多的主体、活动、设施的聚集,从而形成鲜明的地方场景^⑨。克拉克等提出的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三大场景价值维度及核心要素体系,极大提升了场景理论的应用性,推动其实现从文化研究向城市治理与文化发展实践领域的范式转型。国内学者对场景理论

① 萧放、席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与保护原则》,《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

② 林继富:《“空间赋能”:融入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

③ 王明月、马知遥:《离散性空间:文化生态保护的另一种空间形态》,《民族艺术》2021年第5期。

④ 王蒙、黄本亮:《数字媒介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重塑:意义、路径及异化可能》,《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2期。

⑤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第124页。

⑥ Straw W., “Systems of Articulation, Logics of Change: Communities and Scenes in Popular Music”, *Cultural Studies*, 1991, 5(3), pp. 368-388.

⑦ Bennett A., “Consolidating the Music Scenes Perspective”, *Poetics*, 2004, 32(3-4), pp. 223-234.

⑧ 丹尼尔·亚伦·西尔、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祁述裕、吴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译者序第4页。

⑨ 温雯、戴俊骋:《场景理论的范式转型及其中国实践》,《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进行了深入的本土化探讨,在城市、乡村和虚拟社区的场景测度、“蜂鸣”理论、场景营造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及应用进展。

(二)非遗的场景维度及其评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场景理论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内在契合性。金元浦等认为,非遗的创新传承或产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新的场景,活化需要场景,场景推动活化,应依据非遗在当代的生命力对其进行不同的场景化保护^①。陈波、赵润以邻里、设施、群体、活动、价值观的场景五要素为框架,初步构建了我国非遗场景评价指标体系^②。郭新茹等从大运河非遗生活性保护出发,认为非遗为场景提供价值内核,场景则通过不同“舒适物”间的组合,将非遗的价值意涵外化表达,重构了非遗与民众的共生空间^③。围绕不同类型的非遗场景构建,学界亦进行了相关探索。刘中华、焦基鹏探讨了文化记忆机构“非遗+旅游”融合发展路径^④。陈波、涂晓晗则搭建起了以乡土表达、文化传承、价值弘扬为主维度的乡村非遗场景价值体系,并提出以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共同构成动态演进的非遗场景系统^⑤。亓冉、李凤亮设计了非遗传播的场景文化价值维度,划分出非遗的舒适物类别,以场景评价及组态分析提炼出有效的非遗传播模式^⑥。

同时,场景的丰富意涵也为非遗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基于梅洛维茨情境理论的媒介场景研究聚焦于非遗类综艺节目、影视游戏的场景构建,如徐静、杜兴远以《非遗里的中国》为例,指出节目通过多元文化符号的视觉组合、文化传承中的时空场景交融、生活情境中的仪式展演等多维场景来凸显文化价值^⑦。在消费与服务场景领域,有研究提出老字号可以基于自身优势资源,开展功能、情感、互联场景驱动的创新,从而重塑竞争优势^⑧。这些思路亦为非遗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借鉴。

(三)非遗场景的内涵及其构建意义

非遗场景的构建不仅关乎其活态传承,更有助于重构非遗发展的整体文化生态。近年来,“场景牵引”“场景培育”等政策话语的提出,以及各地围绕非遗开展的场景化实践,显示出场景作为资源整合载体,在重构非遗与现代社会连接方面具有的巨大潜力。非遗场景并非单一的空间或活动,而是由文化内核、场景要素与价值观念共同构成的情境结构。其中,文化内核是非遗所具有的技艺逻辑、象征意义与价值精神;场景要素包括承载非遗实践的设施、空间与活动形式;价值观念是指非遗在特定场景中被赋予的意义指向与规范框架。

场景理论为非遗现代传承提供了多维度解释力与建设性框架,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场景理论既探讨文化现象的形成,亦关注主体、设施与活动等要素的组合作用,可观照非遗保护传承的发展历程与当下局面。场景视角推动研究重心从“非遗项目本体”延展至“非遗存续的空间生态”,为分析非遗如何在新的社会空间中重建意义提供了理论工具。二是场景理论探讨了文化现象的流动性,“本土-跨域-虚拟”的理论框架为非遗的流动提供了分析工具,有助于揭示非遗在不同空间形态中如何实现再嵌入。三是场景理论有助于分析场景的主观价值维度,基于舒适物的赋值,将抽象的

① 金元浦:《场景理论与文化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创新——金元浦对话劳伦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 陈波、赵润:《中国城市非遗传承场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 郭新茹、陈天宇、唐月民:《场景视域下大运河非遗生活性保护的策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④ 刘中华、焦基鹏:《场景理论下上海文化记忆机构“非遗+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径》,《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

⑤ 陈波、涂晓晗:《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场景维度设计及其价值表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⑥ 亓冉、李凤亮:《“双创”背景下我国非遗传播的场景表达与组态模式研究》,载顾江主编:《文化产业研究》35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40—156页。

⑦ 徐静、杜兴远:《基于“场景”构建的文化遗产类节目意象生成与价值传递——以〈非遗里的中国〉为例》,《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⑧ 孟朝月、邵伟、杜建刚:《老字号如何借助场景驱动的创新重塑竞争优势》,《南开管理评论》2025年第10期。

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观察、可测量的场景风格,由此可深入探讨非遗街区、非遗景区、非遗小镇等具体载体的场景塑造路径。四是场景理论强调文化、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非遗传承与发展亦涉及文化、经济、社会等多维度的复杂驱动。非遗场景的营造、流动与演化始终与城乡文化建设持续互动,其终极指向是形成“文化-经济-社会”的共生生态。

三、非遗场景的构成与机理

非遗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具体场景的支撑。在前述研究中,与非遗的原生空间、离散空间和虚拟空间相关的研究已初现端倪,但还分散于不同学者的零星探讨中,如有学者提出非遗传承的三条路径,即原生地原生传承、原生地次生传承和离散地衍生传承路径^①。借助场景理论,可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划分为本土、跨域与虚拟三种类型。三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渗透、动态关联,遵循“在地性”的根植逻辑、“延展性”的离散逻辑,以及“转译性”的再生逻辑,共同构建了一个开放、流动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场景体系。

(一)本土场景:跨越传统与现代的原生地保护与传承

本土场景立足非遗的原生地,以“在地性”为根植逻辑,强调非遗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该场景的本质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维系并激活非遗的生命力。根据功能与形态,非遗的本土场景可划分为生活与生产场景、传习与教育场景,以及保存与研究场景等。

生活与生产场景以社区为基本形态。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以社区为中心”的理念,到我国从“非遗进社区”到“非遗在社区”的实践演变,其目的均是以传承群体为核心,培育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让非遗回归日常生活与生产。一方面,非遗的原生社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多数非遗仍根植于乡村,通过融入旅游、文创等产业发展或乡村文化治理,逐渐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而城市中非遗的原生场景则多位于“老城区”“城中村”,并存在向历史街区聚集的趋势。另一方面,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建设为具备产业化条件的非遗项目提供了发展平台。这类基地与广泛分布于乡镇、基于家庭作坊和地方合作模式的小微企业一同构成了非遗生产性传承场景。此外,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基于整体性保护的视角,致力于修复和改善非遗集聚区域的生态环境,是非遗本土场景的综合形态。

传习与教育场景以传承为主要任务。我国已实施多批“非遗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并建设了一批非遗保护传承基地,以开展传习、研学等活动。“非遗进校园”亦成为重要的传承途径,中小学依托地方的传统音乐、舞蹈、美术、技艺等非遗资源开设非遗特色课程,培育非遗的兴趣群体。部分项目还设立了专业院校,如广东粤剧学校以培育社会需要的粤剧艺术人才为宗旨,培养了一代代新传承人。此外,高校非遗保护学科的设立也使非遗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成为可能。从传统的师徒相授到现代的研修培训、校园传承与专业教育,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非遗知识与技艺的传递网络,增强了传承的有序性、专业性和规范性,也扩大了传承范围。

保存与研究场景以知识建构为目标。文博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相关主体通过普查、记录、建档、研究和阐释等一系列行为,评估非遗的生存状态,构建非遗的传承谱系,将非遗从自然形成的民间实践转化为多学科视角下的知识图谱,确立非遗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及社会价值。同时,在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场所对非遗进行保存与展示,这一方面对于一些已失去生存环境和传承体系的非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也使这些文化珍宝得以向大众展示,讲述人类智慧和生活记忆的故事。

^① 黄龙光:《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三条路径》,《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二) 跨域场景: 穿越本土与外域的离散地生长与演化

非遗的跨域场景指非遗离开原生地,在新的地理与文化空间中实现传承、传播与转化的过程,体现了以“延展性”为核心的离散逻辑。非遗的跨域流动首先体现为从乡村到城镇的流动,这一过程一方面源于非遗传承人寻找要素密集市场的自觉需求,另一方面源于更高层级行政区划的资源整合,如根植于乡村的传统仪式可能被认定为市级、省级、国家级甚至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获得更高的关注度与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次,非遗受多种因素驱动从一个地区传入另一地区,实现与当地文化、技术、设计、营销及产业力量的对接,在离散地展示、转化并再生长。依据流动的不同功能,非遗的跨域场景可划分为迁徙与在地化场景、推广与交流场景和旅游与消费场景等,体现出非遗的文化适应性和超地方性特质。

迁徙与在地化场景源于非遗传承人或群体带着非遗的技能、知识和理念等在城乡之间跨域生长,实现异地生根发芽,形成新的非遗空间。跨域非遗在继承传统内核的同时,吸收新环境的元素,逐渐衍生出新的内容与形式,并通过在地化调适形成以原生地为中心的文化扩散圈。在城市化进程中,非遗总体呈现“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趋势。这一点在深圳等移民城市中尤为显著,外来非遗通过传承与创新,逐渐融入地方文化体系,形成新的地方传统。但也存在着反向流动,如大理鹤庆新华村的“新村民”与景德镇的“新手工艺人”,为本土技艺带来新的呈现。

推广与交流场景体现为非遗在多个层面的展演、交流、研究与合作。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合作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全国性活动,再到地方性非遗活动及项目巡展,各类形式的活动为非遗跨域流动构建了集聚与对话平台。媒体的聚焦与公众的参与则进一步将非遗从地方性知识提升为区域、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文化共识,显著增强了其可见度与影响力。

旅游与消费场景为非遗的跨域流动提供了市场化路径。非遗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天然的“旅游吸引物”,体验民俗风情、观看民族歌舞表演等在旅游业发展初期便被纳入产品体系。随着非遗保护与发展意识的增强,福建、浙江等多地已出现专门的非遗研学或旅游路线。同时,游客在原生、复原或再造的场景中了解、感知非遗及其生长土壤,随后把经历、记忆和纪念物带回生活之地与亲友分享,或在社交平台记录传播,不仅为非遗所在地带来旅游收入,也主动成为非遗的传播者,为其他旅游行为提供参照。非遗文创产品和展演则促进了非遗从文化资源向文化商品及服务的转化与流通,以非遗市集、街区等为代表的消费场景可能产生聚集效应,更为集中有效地推动来自相关区域非遗作品的经济价值转化,但也可能产生地域标识模糊、产品同质化以及“非遗”一词使用泛化等问题。

(三) 虚拟场景: 融合虚拟与现实的数字化转化与创新

数字化、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为非遗的再现、转化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工具与空间。虚拟场景展现出“转译性”的再生逻辑,即通过数字手段,将非遗的文化内涵、美学特质与技艺体系以虚实结合的方式感知、体验与再创造,是非遗突破时空限制的重要载体。总体来看,非遗虚拟场景可分为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数字化创作与转化、数字化传播与体验场景^①。

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场景包括非遗数据库、非遗数字博物馆和非遗数字化教育场景,侧重于非遗原真形态的保护。目前,我国已建成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为代表的国家级综合性非遗专业数据库,各省市也积极建设区域性的非遗综合数据库,并涌现出中医药、传统纹样及云锦等专题资源库与数字博物馆。相关平台还推出非遗知识普及与美育线上课程。该场景主要体现为非遗资源的数字复刻与孪生,即通过高精度采集技术,尽可能原真地记录、保存并呈现非遗形态与信息,为后续数字化创新奠定数据基础。

数字化创作与转化场景涵盖影视综艺、动漫游戏、数字藏品等数字文化业态,注重非遗的内涵诠

^① 温雯、赵梦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场景与构建路径》,《理论月刊》2022年第10期。

释和艺术表达。如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以国家级非遗广东醒狮为叙事线索,讲述少年的成长故事;《黑神话:悟空》则将陕北说书和少林功夫等非遗项目融入游戏情节,为玩家带来既熟悉又新奇的视听体验,甚至引发海外玩家对“中式 rap”的热情翻唱和旅游朝觐,成为文化出海的优秀案例。非遗的文本、符号、技艺、观念等与各类数字艺术相结合,形成新的艺术形式。

数字化传播与体验场景以新媒体平台、云节展、云演艺等为介质,构建了非遗的新传播矩阵。短视频、直播平台成为非遗数字传播的重要阵地,抖音、快手等纷纷发布与非遗传习、创作者和优质内容相关的扶持计划,构建新的内容和交易生态;“全景故宫”“云游敦煌”“云上中轴”等小程序、应用程序或网页端的云场景尽管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高清晰度扫描与再现为框架,但融入了丰富的仪式、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互动沉浸的参与式空间。

四、非遗场景的流动与演化

非遗作为一种活态传承的文化实践,在时空流转中经历着持续的“运动”与“变化”,具体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把握其场景特征。一是文化的“空间扩散”,非遗如何在不同的地理和媒介空间中移动、重组,这指向了“流动性”问题。二是形式的“适应性演变”,非遗场景如何在内外部动力下进行自我调整和形态改变,这关涉“演化性”问题。两者并非先后关系,而是同时发生、相互嵌套,共同构成了非遗在当代社会寻求生存空间与维系文化连续性的基本逻辑。

(一)流动性:场景的要素重组与空间互动

当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的世界。正如孙九霞等学者指出的那样,各种类型的“流动”表征并重塑着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①。鲍曼的“流动的现性”、卡斯特的“流动空间”与厄里的“新流动范式”等理论共同揭示了社会关系与文化形态受到跨地域流动与数字网络的冲击,其运作逻辑不再受制于固定的地域边界。非遗虽根植于地方,但也深受这一趋势的影响。因此,“流动性”在非遗语境中并不只是某个非遗项目在地理上的位移,更指向构成非遗场景的核心要素——人(传承者、从业者、参与者)、物(非遗作品、商品)、信息(技艺、符号、知识、观念)、资本(投资、开发、运营)在不同时空维度的持续分离、重组与再配置。在不同类型的场景中,这些重组与再配置也呈现出差异。

首先是本土场景中社区边界的消解与重构。高流动性社会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非遗“社区”的内涵。原本依靠地缘与血缘维系的传统共同体正在松动,逐渐转向一种基于业缘与趣缘的流动共同体。比如在一个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非遗工坊,可能同时聚集着本地传承人和手艺人、外地学徒、自媒体博主、研究非遗的学者、参观的游客等多个主体。这些来自不同地方、带着不同目的的人频繁交往,加上网络社群的连接,使得知识、技艺和身份认同在本土场景中持续地流动与再生产。其次是跨域场景的“脱域”实践与资本转化。非遗之所以走出原生地,正是缘于“脱域”机制的运作。在专家系统和象征符号的共同作用下,“遗产化”进程将传统民俗文化提炼为权威认定的文化符号。由此,某个村寨的舞蹈、音乐或手工艺,得以跳出原有的生活语境,进入更为广阔的旅游市场、文创产业乃至全球文化市场的流通体系,实现从地方性文化资源向全球性文化资本的转换。最后是虚拟场景中的全球扩散与具身体验。一方面,数字技术使非遗获得数字生命,在数字空间中以新的形态存在,从而跨越了地理边界,在互联网平台实现全球共享。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加速了非遗的流动,并给予观众通过点赞、转发、评论以及二次创作等方式参与传播的便捷通道。

同时,非遗场景的流动性也蕴含着多重关系与内涵。一是流动与积淀的共生。非遗的流动可能产生文化积淀,即作为外来文化的非遗进入新的文化语境后,与当地文化经历持续的调适与融合,逐

^① 孙九霞、周尚意、王宁等:《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地理研究》2016年第10期。

步适应本地人群的价值观和消费习惯,最后成为新的地方文化的一部分。深圳“非地非遗”理念的提出与践行即最好的例证,如平乐郭氏正骨法、剪纸艺术(田氏)从河南、陕西来到深圳落地生根,成为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二是向外与向内的并行。在非遗从本土到跨域、虚拟流动的总动向中,也存在着资源、人才与技艺向本土的反向流动。随着非遗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和本土非遗产业的发展,从城市回归的“返乡人”和慕名前来的“新村民”为本土场景注入新鲜的血液,也增强了本土与外域的对话与交流。三是传承与传播的交叠。一场面向“他者”的跨域展演,不仅在传递历史记忆或文化技艺,也在唤起持有者对自身文化遗产的再认识,从而自觉启动具有延伸性、持久性的群体传承^①。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内容生态中,传播对传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②。当非遗传承人打开摄像头,直播作品的制作流程时,这一行为既是传播,也是传承。四是权力结构的变化。非遗场景的流动离不开技术、资金、政策、社群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这些要素流动的方向、速度与规模直接影响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空间,也反映出不同主体在场景中的话语权差异。例如,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项目往往会获得更多资源和更快的流动速度,这也使得一些生命力较弱的非遗项目进一步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二)演化性:场景的动态变化与功能重构

从场景演化的相关研究来看,过往的场景研究主要以“共时性”为主,由此场景通常被假定为相对稳定的,继而学者在单一的时间点上对多个地方的场景类型进行分析。然而,一地的场景营造往往也与当地经济、居住群体、价值观取向等因素的变化密切相关,可见场景同样具有动态演变的一面。非遗场景亦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需求调整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进。技术进步、政策导向与市场条件的变化,都会对非遗场景的结构与功能产生影响。

Silver等通过对美国城市场景历时性变化趋势的分析,提炼出了场景演进的发展、分化、防御和扩散四种变化模式^③。在场景演化本土化探索中,有学者基于对中国乡村文化场景演化的“历时性”研究,提出其时空演化具有非线性、自组织与他组织、内外部动力共同驱动等特征^④,其演变是人文与自然互动的产物,涉及群落、价值与符号系统的复杂互动^⑤。结合非遗的本土实践来看,非遗场景的演化是多重动力交织的结果,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动态调整实现与外部环境的适配以及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广州市恩宁路从作为广州对外通商口岸重要商住街区时的“发展模式”,到基于岭南文化形成民居文化、粤剧文化、醒狮文化、南拳文化等的“分化模式”,再到城镇化时期社区联合学者、社会团体抵制大拆大建的“防御模式”,进而到“微改造”时期增加文创商店、博物馆等业态的“扩散模式”。

就非遗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非遗受到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以及数字文明的影响,但非遗场景演化并非线性更替,而是多种模式的叠加与互动。其演化动力至少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内部的自我延续需求。非遗项目在面临传承后继无人的困境时,主动打破以家族、师徒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内部传承机制,面向公众拓展传承场景,出现院校教育、数字传习等新形式。在面对市场流失时,非遗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如原本以实用为主的技艺增加了审美、象征与体验功能。原本以社区内部传承为主的文化实践,转向面向公众的展示与交流。二是外部环境的推动作用。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得非遗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但也产生了更适合现代生活及消费的新形态,如传统作坊演变为生产基地,庙会表演转化为剧场演出。在各类外部因素中,数智技术成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不仅构建了非遗的数字空间,还让人工智能参与到场景演化与生成的过程中。三是多重主体的积极介入。政

① 黄龙光:《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三条路径》,《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② 杨红:《互联网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焕新现象观察》,《艺术传播研究》2026年第2期。

③ Daniel Silver, Thiago Silva, Patrick Adler:《场景的演化:四种社会发展模式在场景中的应用》,庞亚婷译,《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④ 陈立豪、陈波:《乡村文化场景的时空演化机制研究:基于Z村的考察》,《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11期。

⑤ 陈波、陈立豪:《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府借助政策引导和制度设计,如通过传统村落、生态保护区等的认定,引导非遗场景的发展方向。市场则通过资本投入与运营,使非遗场景向规模化和商业化发展,如非遗聚集地逐步发展为非遗街区或小镇,成为旅游与文化消费的热门目的地。学者也不再局限于民俗学的视角,而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化产业、艺术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切入非遗研究,形成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在以上动力的共同驱动下,非遗场景正从传统的生产生活空间,转向复合、多元、虚实并存的场景形态。流动性与演化性共同描绘了非遗在时间和空间中复杂而动态的发展过程。因此,非遗的活态传承并非凝固在某个固定的时空节点,而是在场景的不断流动与演变中维系文化的连续性,并持续生成新的形态。

五、非遗传承与创新场景体系的构建路径

非遗现代传承的关键在于为脱离原生情境的非遗重建地域连接与社会关系,通过有意识的场景构建,在原生地、离散地和虚拟空间中实现有效的“再嵌入”。场景理论所提出的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价值维度,为这一构建过程提供了生活化、审美化与价值化的路径参考(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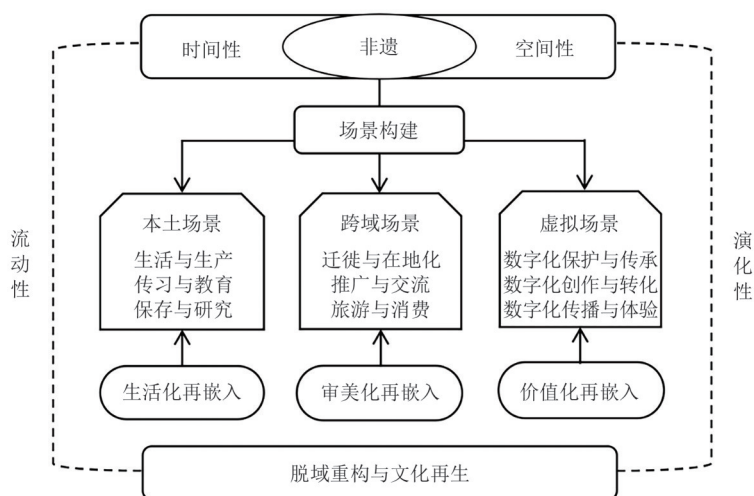


图1 时空视域下非遗场景体系的构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本土场景的“生活化再嵌入”:以真实性重建本土关联

本土场景是非遗传的基础场所,其重点是通过重构关联、激活功能与赋予能动性,使非遗重新嵌入地方生活,守护其真实性。一是从时间和空间维度重建非遗与地方生活的连接。就空间而言,可将非遗场景深度融入传统村落保护、历史街区更新与城乡社区建设,使传统工坊、古戏台等非遗空间与生活空间实现嵌合;就时间而言,则应推动非遗回归地方的岁时节庆、人生礼俗与日常活动,以传统文化为纽带重建地方认同。二是强化生产性保护与功能转化。通过主题市集、乡土教育、文旅开发与生活美学转化等路径,将非遗纳入地方特色产业与社区营造,使其在现代生产与消费体系中获得持续的功能性价值和新的应用场景。三是确立传承人与社区在场景构建中的核心主体地位。生活化再嵌入的根本在于“人”的回归,可通过传承人工作室、社区文化中心、非遗协会及青年传习社团等建设,保障传承主体在场景设计、活动组织与价值阐释中的参与权与收益共享权。

(二)跨域场景的“审美化再嵌入”:以戏剧性激活转化动能

跨域场景是非遗走向更广阔的大众社会、消费市场和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要通道。其重点是在保

持文化内核的前提下,通过叙事设计、体验营造与产业连接,激活非遗的戏剧性表达,使其转化为现代公众能够感知、理解和参与的文化经验。一是提升非遗的叙事能力与阐释深度,即以策展思维、故事化展演等手段,通过多媒介表达形式,将非遗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转化为有情节、有温度、有共鸣的叙事内容,让受众读懂非遗。二是强化体验化与互动化设计。诸如节庆展演、沉浸式展览、研学旅行等均可作为场景载体,通过感官及心理沉浸,让公众在参与中感受非遗的魅力。尤其是对于年轻群体,互动体验会更有效地形成情感连接和文化兴趣,推动非遗的代际传承。三是规范审美转译、明确转化边界,即深入挖掘非遗的材料工艺、审美范式和文化内核,结合现代设计语言实现转译,在尊重文化原真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表达。对于适合产业化的项目,可建立传承人、设计师、企业与院校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让非遗融入当代的生产与消费;对于仪式性或高度依赖社区语境的项目,则应以公共文化服务、教育、研究为主要场景,避免以市场逻辑代替文化逻辑。

(三)虚拟场景的“价值化再嵌入”:以合法性确立数字认同

虚拟场景是数字时代非遗传承创新的关键场域,重点是破解数字空间中权属混乱、价值失真、主体缺位的脱域风险,以数字转译、社群协同和制度规范确立“合法性”。一是推动深度数字转译。数字化并不止步于非遗数字形式的保存,而是将其转化为适应数字媒介的新表达形式,如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多媒体等技术,系统呈现非遗的技艺原理、传承谱系与文化语境,构建准确、完整而有层次的非遗数字资源库。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数字传承体系。鼓励传承人与设计师、技术专家、研究者等合作开展直播传习、线上课程、在线社区互动等,让数字平台成为新的“传习空间”,形成新的“趣缘社群”;通过数字内容创作、IP共创等方式,形成弱连接式的传承网络。三是完善数字伦理与权利规范。非遗数字化涉及传承人权益、集体文化权益、知识产权与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必须建立清晰的制度框架,以明确数字资源的权利归属、授权流程与使用边界,并确立数字化伦理准则,严禁脱离文化内核的符号挪用、歪曲篡改和过度商业化,同时构建多方协同的审核监管机制,为非遗数字传承提供合规的制度保障。

六、结语

非遗的现代传承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场景重构”。场景理论与“脱域-再嵌入”视角的结合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中国非遗实践的解释性框架。非遗的“脱域”既带来了传承危机,也孕育了新的可能。而场景正是连接非遗时空性与现代社会“再嵌入”需求的关键载体。非遗场景可分为本土、跨域、虚拟三种形态。其中,本土场景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空间,以“真实性”为价值导向,推动非遗回归并融入原生地的日常实践;跨域场景是实现转化与传播的主要通道,以“戏剧性”为转译逻辑,促使非遗在不同地域的文化和资源之间展开交流对话;虚拟场景是数字时代非遗实现创新与发展的新场域,以“合法性”为制度保障,助力非遗在数实融合的空间中获得新生。各类场景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为依托,在时空流变中呈现出流动与演化的双重特征。面向未来,非遗场景的构建应在尊重非遗的文化内核、传承主体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多维方式拓展、重塑与再造非遗的传承与创新空间,推动不同场景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使非遗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更有效的嵌入,实现系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Scene Construc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Spatiotemporal Perspectives

Wen Wen^{1,2} Zhao Mengdi³

(1.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P. R. China;

3. School of Cultural Industries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P. R. China)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as a holistic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its characteristics as a temporal and spatial “field.” The processes of modern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have been reshaping the temporal rhythm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society, steadily weakening the living contexts on which ICH depends and confronting it with the challenge of “disembedding.” Grounded in the spatiotemporal nature of ICH, this paper integrates scene theory with the “disembedding-reembedding” perspective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CH scenes sui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Drawing on scene theory, the paper categorizes the spaces in which ICH survives and develops in modern society into three types: local scenes, trans-local scenes, and virtual scenes. Local scenes emphasize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ICH and it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structure,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Trans-local scenes refer to the cross-regional transmission of ICH-related skills, symbols, and values, enabling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value and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al forms beyo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Virtual scenes employ digital tools to transcend physical carriers, allowing ICH to be perceived, experienced, and recreated in entirely new ways as “innovative carriers” that break through spatiotemporal constraints. Rather than being discrete, the three types of scenes interpenetrate and are dynamically interrelated, following the rooting logic of “locality,” the diasporic logic of “extensibility,” and the regenerative logic of “translatability.”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an open scene system for IC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haracterized by fluidity and evolvability. Fluidity addresses the synchronic movement of ICH resources across geographic and media boundaries, encompassing multiple relationships and connotations: the symbiosis of flow and sedimentation, the interweaving of outward and inward flows, the overlap of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power structures. Evolvability focuses on the diachronic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of scene structures in respons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driven by internal developmental needs,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orce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multiple actors. Fluidity and evolvability jointly shape the dynamic generation and sustained operation of ICH scenes in modern society. The three value dimensions of scene theory—authenticity, theatricality, and legitimacy—further inform strategies for ICH scene construction, oriented toward re-embedding in everyday life, aestheticiz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In essence, the moder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ICH is fundamentally a process of self-adaptation and scene reconstruction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im to move ICH beyond its positioning as mere “heritage” or “resource” and transform it into a continuously regenerating form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practice.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cenes theory; Disembedding-reembedding; Fluidity; Evolvability

[责任编辑:王玲强]